

衡阳的书院在历史上曾辉煌一时，特别是宋代和明代，衡阳的石鼓书院和文定书院俨然成为全国学术交流的中心。近日，衡阳“才高八斗”全民国学电视争霸赛精英赛冠军张颂华做客国学讲座，向大家讲述衡阳书院的发展——

# 书院文化是衡阳历史文化的一座高峰

■文/本报记者 许珂 图/本报记者 黄沐



张颂华

书院是唐中后期在我国兴起的一种新的教育机构。初时，原为藏书、校书之地，或私人隐居、治学之地；到了宋代，书院便将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成为著名学者授徒讲学、培养人才的地方。

“天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晚清重臣曾国藩《重修文定书院记》的这两句话指出了衡阳书院在中国历史上曾经的地位。近日，衡阳“才高八斗”全民国学电视争霸赛精英赛冠军张颂华做客国学讲座，向大家讲述衡阳书院的发展。

## 邨侯书院是衡阳书院史的“鼻祖”

追溯衡阳书院的起源，位于南岳衡山的南岳书院（即邨侯书院）是衡阳地区最早出现的书院，也是全国最早的书院之一。它是唐代传奇宰相李泌的儿子随州刺史李繁为纪念其父在南岳读书而建，既奉祀、藏书，又供人游览、讲学。

邨侯书院曾有四处：一处是集贤峰下今岳云中学内。宋宝庆年间，徙建于集贤峰下，改称邨侯书院。后因战乱被毁，嘉靖十三年在其旧址重建，以祀古今留寓南岳之名贤，改称集贤书院；第二处在烟霞峰下。原为唐代邨侯李泌隐居之故宅，名端居室，即藏书处，岩上有李泌手书“极高明”三字石刻，第三处在烟霞峰腰（即现存邨侯书院）。清光绪十六年，邑人陈治与集贤书院山长戴心葵等移建邨侯书院于今址。民国二十一年重修。现为一进五间石室，石墙灰瓦，悬山式建筑，十分简朴，却也古风古貌。石屋内已无藏书，也没有其他历史资料可供浏览。正中塑李泌像，四周悬挂有关邨侯的故事典故绘画。石屋外空坪对称地竖立两块巨石，上面刻有郭沫若先生访邨侯书院所题写的诗词手迹“中原龙战玄黄，必胜必成待自强。暂把豪情寄山水，权将余力写肝肠。云横万里长纓展，日照千峰铁骑驰。犹有邨侯遗迹在，冠乎重上读书堂。”

书院培养造就出了名人，名人让书院影响力更大，声名远播的书院又能吸引更多的名人来书院，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而号称“中唐第一贤相”的李泌与南岳的渊源，让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南岳书院从诞生之日起就笼罩了一层耀眼的名人光环，为后世衡阳书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说起中唐史上突出的人物——李泌，那可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踏入朝局之日就一定会

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也十分清楚施展报国志的前提是自己能够从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生存下来。凭借学贯三教的修行与智慧，李泌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处世哲学和处世态度，最终让自己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既能报国有为，又能善终自全。

可以说，李泌以经天纬地之才和忠贞淡泊的心灵，实现了大自然和政治的高度默契统一，达到了中国文化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新唐书》对他的评价极高：“其谋事近忠，其轻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邨侯书院也因为李泌的传奇经历成为读书人向往的圣地，从而成为唐代最有影响力的书院。

## 宋代的石鼓书院与文定书院见证了衡阳书院的发展与繁荣

今天的石鼓书院是衡阳的一张文化旅游的名片，基本上生活在市区的衡阳人都去过石鼓书院和石鼓广场，但是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石鼓广场上有一座雕塑，上面有七个人，这七个人就是著名的石鼓七贤，他们都是历史上为石鼓书院的创立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

按照时间顺序首先要讲到的是七贤中的第一人韩愈。

石鼓书院建成于宋朝，但究其源头却要从唐朝说起。韩愈不是石鼓书院的创办者，也并没有在石鼓书院讲过学，但是却有不解之缘。在唐德宗贞元3年，宰相齐映贬到衡州任刺史，在石鼓山之东面建一凉亭，取名为“合江亭”。顺宗永贞元年大文豪韩愈由广东至湖北，途经衡州，为此亭写下著名的《合江亭序》，其中的“红亭枕湘江，蒸水会其左。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为全篇中的名句。

石鼓七贤中的第二个人物是李宽（又名宽中）。唐元和五年，李宽被韩愈的《合江亭序》诗中描写的美景打动，放弃了当时名相裴垍的人幕邀请，不远千里从北方来到了衡阳，一经停留便再无去意。于是，李宽在衡阳城北蒸水与湘水交汇处的这座小山上筑庐读书，形成了李宽中秀才书院即为现在石鼓山书院的雏形。

在经过唐末和五代的百年沉寂后，衡阳书院的发展在宋代迎来了一个高峰。宋代的文教最为昌明，书院最为发达，这一时期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涌现，从而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四大书院，而石鼓书院就在这时诞生了。

宋初，石鼓七贤中的第三位李士



真（李宽在衡阳的后裔族人）慕先人之高义，拿出自己的私财在李宽读书的旧址之上重新修建书院，开坛收徒讲学，先后被宋太宗、宋仁宗两位帝王御赐“石鼓书院”匾额。后来随着理学的兴起，这里成为了诸多理学大师进行学术交流和传播思想的平台，书院因此而走向鼎盛。

石鼓七贤中的第四贤便是大名鼎鼎的理学鼻祖《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在中国著名的私家藏书楼浙江天一阁的藏本中，有一本明代衡州知府李安仁等三人合著的《石鼓书院志》中有这样的记述：“濂溪周公敦颐，古今称为绝学，其有声于石鼓，当不下唐宋诸儒。”这就说明周敦颐极有可能在石鼓书院讲过学，做为最早来石鼓书院讲学的学术大师。

第五、第六位是对书院的历史地位、学术地位影响最大的两位学术泰斗——张栻和朱熹，他们二人与吕祖谦并称为“东南三贤”。张栻十分景仰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宏，在胡宏去世前来到衡阳拜其门下。张栻凭借其个人卓越的才华将湖湘学派推上了历史的高峰，并奠定了湖湘学派经世致用、传道济民的学术传统。朱熹也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与张栻在完成了“朱张会讲”之后来到石鼓书院讲学，张栻请朱熹作《石鼓书院记》，为石鼓书院确定了办学的宗旨、指导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相关章程，使石鼓书院之名有声于天下。之后，张栻在亭中立碑，亲书韩愈《合江亭》诗和朱熹的《石鼓书院记》，由人将此镌制成石碑，置于石鼓书院内，这就是著名的石鼓书院“三绝碑”。

石鼓七贤中的最后一贤名叫黄榦。他的名气比起韩周张朱几位要逊色不少，但其在南宋一朝名声却是不小，他是朱熹门下四大弟子之一。他对石鼓书院的最大贡献是在他提举湖南学政时，奏请朝廷，用国家财政资金买下了茶陵田350亩做为石鼓书院学田，以此做为书院的经济来源来供养学生。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件极大的善政，为石鼓书院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障。

宋代除了石鼓书院之外，衡阳还有另外一座书院也开始声名鹊起，这就是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安国、胡宏父子所创办的文定书院（现为岳云中学“春秋楼”）。胡宏因为坚定主张抗金，所以在秦桧当政时期坚决不与其合作，只在其父创办的碧泉书堂讲学，而后因其父胡安国被朝廷破格赠谥为文定，为纪念其父于是将碧泉书堂改名为文定书院。做为湖湘学派奠基人的胡宏，除了学术精湛之外还特别善于培养学生，如张栻、赵棠、向语、赵师孟、吴翌、彪居正等一大批南宋著名的学者都是他的学生，如此众多的优秀人才从此走出，文定书院在南宋迅速崛起，成为了湖湘文化的发源地，其影响力已经不亚于石鼓书院。

## 清代，船山书院成为衡阳书院的“执牛耳者”

随着清朝思想专制的空前加强，大兴文字狱，衡阳的书院虽陆续恢复，但已经失去了往日自由讲学的学

术氛围。而衡阳书院重新复兴的标志就是船山书院的创办。

近代历史上，湖南人常以事功鸣于世，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等人以一介儒生草檄于乡里，挥旌于荒野，以儒生转型为武人，铸成数世勋名，实乃旷世罕见。这批成功的湘籍人士中，有不少是从衡阳走出的，与衡阳的书院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中的两位曾国藩和彭玉麟。

曾国藩曾经在衡阳的双桂书院读过书，特别是在建立湘军对抗太平军之初，他饱受磨难与屈辱，最后不得不从长沙退到衡阳，最终在此编练水师，把湘军带向了成功，所以他对衡阳感情很深。在衡阳求学期间，他深受船山之学的影响，之后即是在南征北战之时，他也是每日必读船山之书。彭玉麟则是近代衡阳涌现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书画家。他曾经就学与石鼓书院，后以读书人的身份投入湘军，成为湘军水师创建者、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这两位从衡阳书院中走出的杰出人物成为衡阳近代书院复兴的重要推手。

和曾国藩相比，彭玉麟对衡阳书院的复兴贡献更大。他除了积极参与自己曾经的母校石鼓书院的各项活动之外，最大的贡献就是亲自参与创办了近代著名的船山学院。

清光绪八年，湖南提学使朱迪然倡议建立“船山书院”，彭玉麟、王之春、杨概、程商霖、蒋霞初等集捐，将王船山出生地衡阳城内王衙坪的“船山祠”，创办为“船山书院”；书院内仍祭祀船山神位，旨在学习、研究“船山学说”，传播“船山思想”，这是中国最早以“船山”命名的学堂。在船山书院的创办过程中，彭玉麟一个人就捐出了白银12000两，用于在东湖岛购地修建校舍，书院建成后他又以兵部尚书之尊亲自题写“船山书院”四个大字，并撰写楹联。而此时，曾国藩之弟两江总督曾国荃也将家中珍藏的《船山遗书》版片320卷捐赠给船山书院，有如此众多的名人参与，船山书院从此“名声大噪”，迅速崛起成为衡阳书院的“执牛耳者”。

船山书院从创办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山长的选择和教师聘任，历任山长都是大儒，教师也多为当时的饱学之士，如陈文镒、夏时济、徐仁铸、黄遵宪等。同时，船山书院还有名儒掌管、名师开讲，有强人和雄厚资金支持，学院不发达都不可能了。如，在王闾运任山长之后，他果然不负众望为船山书院培养出了旷代逸才杨度，著名的王门三匠：木匠齐白石、铜匠曾昭吉、铁匠张正阳等一大批杰出人才。优秀人才的不断涌现迅速吸引了省内外学子来此求学，一时间有了“学在船山”的美誉。

但是，随着近代化的脚步来到中国，西学东渐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近代化的科技、思想、文化、教育猛烈地冲击着中国的各种传统，书院这种在中国延续千年的传统教育形式也终于难以抵挡，随着民国的建立，中国的教育体制、教育方式、教学内容都开始走向现代模式，以船山书院为代表的衡阳的书院也无可奈何地向学堂或者现代学校转变，或是就此荒废没于野外，最终成为湮灭的辉煌尘封于历史的记忆之中。

## 曾朝节：致位通显，持身廉正

曾朝节（1534—1604年），明朝湖广省衡州府（今湖南临武县曾家岭村）人，他自幼隽朗不群，十七岁为府学生员。万历五年（1577年），高中探花后授翰林编修，任职史官，任《大明会典》纂修官。

万历十三年（1585年）以秩满升侍讲，编纂《六曹章奏》。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升任国子监祭酒。两年后又升为南京礼部右侍郎兼经筵讲官。他持论公正，从不过激之辞。每次都因事进谏，措辞委婉，循循善诱。遇事则多方启迪，力求达于正道。光宗待他以宾客之礼。他任礼部尚书之时，以直言正论，为神宗所倚重。居官20多年，以忠诚勤勉获得神宗的眷顾，拟选入阁。他却上疏以年老坚辞不就，并请乞归田里，神宗不允。曾朝节连着上奏五疏，才获得应允。

曾朝节虽在朝中做官，却心系故乡衡阳。

他曾在衡阳倡修来雁塔。清乾隆年间的《衡阳县志·古迹》中就有相关记载“万历辛巳（1581年），宗伯曾朝节倡郡人建浮屠其上……经十三载而告成。”

曾朝节出身寒微，致位通显，而持身廉正，居处俭朴。每次他回临武扫墓，因乡间道路狭窄，不能容车马，大家商议扩修。但曾朝节以有伤农田，坚决不允。他在京城购买土地，创设京师湖广会馆，提匾额“瑞春堂”，还在家乡购置义田，以周济族中贫困之人。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曾朝节病逝于京师寓所。神宗诏遣大学士李廷机、右谕德萧云举谕祭葬如例，赠太子太保，谥“文恪”，另遣官护丧归故里。

（记者胡建军根据市志办提供的资料整理）

## 衡阳历史文化小辞典

人物系列(24)

## 用典释义

## 独以俭素为美

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应之曰：“孔子称‘与其不逊也宁固’；又曰‘以约失之者鲜矣’；又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古人以俭为美德，今人乃以俭相诟病。嘻，异哉！”——《训俭示康》(北宋·司马光)

### ■译文

许多人都把奢侈浪费当成是一种光荣，但我却在心里独自把节俭朴素看作是一种美德。别人都因此讥笑我固执、不够大方，可我不认为这是什么缺陷。面对众人的讥笑，我是这样回答他们的：“孔子说‘与其不谦逊，宁愿固陋’；又说‘因为俭约而犯过失的，那是很少的。’又说‘有志于探求真理但却以吃得不好、穿得不好、生活不如别人为羞耻的读书人，这种人不值得跟他谈论的。’古人把节俭作为美德，现在的人却因节俭而相互嘲讽，认为这是一种缺陷。嘻，这是多么奇怪的事！”

### ■解读

这段话选自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所著的《训俭示康》。这是司马光写给其子司马康

## 国学教育

### 中国古代技术发明之四

## 养蚕



《康熙御制耕织图》中的采桑场景

蚕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经济昆虫之一。蚕的经济价值在于蚕丝，是主要的纺织原料之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的国家。关于养蚕的起源，古史中有伏羲“化蚕”，嫫祖“教民育蚕”的传说。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表明，在距今5000多年以前，先民已经开始养蚕。其中最重要的证据是河南省荥阳市广武镇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丝织物残片，从纤维来看，其单茧丝截面面积为36—38平方微米，截面呈三角形，是典型的桑蚕丝，其年代可追溯到距今5500年左右。此外，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距今约4000年）出土的绢片、丝线和丝带，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距今约6000年—5600年）出土的半颗蚕

茧，都为养蚕起源的时间和地点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周代，养蚕已有专用蚕室。公元3世纪后期，出现了小蚕恒温饲养，说明当时对于蚕的生长与温度之间的关系已有一定的认识。但直到元代，《士农必用》中才对蚕生长的各阶段所需温度有详细说明。晋代对于蚕的微粒子病和软化病已有所认识，时称“黑瘦”和“伪蚕”。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人们还从种茧的选择和盐腌贮藏方面来防治蚕病。宋元时期，对于蚕病的防治更进一步，贮茧方法除盐渍之外，又出现日晒和笼蒸。与此同时，作为防治蚕病主要手段的浴蚕方法也得以改进。早期浴蚕主要在川中进行，宋代出现了朱砂温水浴法，元代出现天浴，利用低温选优汰劣。明代有天露、石灰水、盐水浴种等方法，并采用杂交方法培育嘉种，以提高蚕的防病能力，这是养蚕技术上的大创造。

中国养蚕技术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世界蚕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公元前11世纪，养蚕技术传入朝鲜，随后传入日本。秦汉以后，中国的养蚕技术沿丝绸之路传入中亚、南亚及西亚地区。公元6世纪中叶，拜占庭帝国通过印度僧侣从中国私运蚕种至该国，是为西方有蚕业之始。

（据新华网）

## 国学故事

在江苏省涟水县五岛公园南岛涟漪湖畔，有一座卓然耸立的画亭，亭前是一口砚形池塘，曾是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挥洒丹青、洗染残墨之处。米芾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在诗、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鲜为人知的是，米芾还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清官。绍圣四年（1097年），米芾出任涟水军使。据地方志记载，在涟期间，米芾“多惠政，任满归，囊橐萧然”。米芾的为政为人得到老百姓交口称赞，时人说：“自过扬子渡，行路无不咨嗟咏，每道及公名姓，则以手加额上。”米芾刚到涟水上任时，正逢旱灾，继遇水灾。他到高邮一带查勘水

## 米公洗墨池

情，发现许多通湖水道，初为防旱救田，填土塞断，发生水灾时，地主豪绅只顾一己私利，并不疏通，地势低洼之处，积涝无法排泄，有很大隐患。他便上书上司，控诉“豪姓因而擅之，恐非公家之利也”，为民请命的殷切之情溢于言表。

无论向來是古之為官者向往的治理境界。米芾曾写过一首《獄空行》，当时楚州（今江苏淮安市）辖有五邑（包括涟水军），人口达一百多万，发达的运河经济，让楚州千帆相接、四通不断，白居易赞其为“淮水东南第一州”。楚州太守治理有方，断狱“迎刃无留滞”，以致五邑中有两狱形成了“獄空久无事”的局面，而这其

中也有涟水军使米芾的功劳。

“淮风吹戟稀讼牒，典客闭门闲壶浆”，米芾在涟期间，政通人和，风清气正，以致诉讼稀少。正因此，米芾在公事之外才有闲暇挥毫泼墨、吟诗作赋，创作了许多诗词及书法作品，其行文落款常署“涟漪老全”和“清涟老令”，充分说明他对“千古涟漪清绝地”的涟水热爱之情。

米芾对待书法的态度非常严谨。他曾于中秋登海岱楼赏月，看到淮河入海处辽阔壮丽的景色，有感而发写下了《中秋登海岱楼作诗帖》，帖中米芾共前后抄录诗文两次，中间加入一行批注“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足见其求好心切。明代都穆